

从布罗代尔的市场理论看中国农业国际化的必然性

张 蕊

[摘要] 布罗代尔提出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市场组织层次理论。这个理论启示我们, 中国农业必须走国际化之路。由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和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一方面, 我们不能把中国的粮食安全寄托于国际市场; 另一方面, 中国的食物安全又不能不融入国际大市场中, 走以劳力换土地之路。中国农业国际化, 是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 布罗代尔; 市场经济; 农业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 F014.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 (2003) 06-027-03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系 厦门 361005

一、布罗代尔的市场理论与我们的差距

布罗代尔在其《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 把近百年的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即最基层, 涉及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衣、食、住、行……)。在世界广大地区里, 这个时期的大量经济活动是自给自足, 以货易货, 互相服务, 范围狭窄的日常生产与消耗, 布罗代尔称之为“物质文明”(他承认这是一个含糊不清、容易误解的名词)。第二层是市场经济(书名上简称为“经济”), 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这些机制与农村活动、摊贩、店铺、作坊、交易所、银行、集市、市场紧密相连, 没有这种按供求关系建立的市场, 就没有一般意义的“经济”, 因此市场意味着解放和开放, 是与另一个世界接近的媒介。按照布罗代尔的解释,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它有时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经济。第三层是资本主义, 这是一种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这种垄断最早是与集市并行存在的, 一些微型资本家利用信贷与远距离贸易操纵市场价格, 逐渐发展成大资本家、批发商、银行家、交易所大王, 成为一个有钱有势的社会统治集团, 他们不仅控制国内外市场, 而且往往对市场经济起阻碍、破坏作用。

在布罗代尔看来, 市场经济并不简单地就是买与卖, 这其中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简单的面对面交易为市场经济的底层。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交易, 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背景和普遍形式, 至今我们依然到处可见。但是, 它的上层则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 买

者和卖者互不相见, 且时空长度越拉越长, 而中间商作为一个独立部分充当其桥梁和纽带。市场经济不仅把市场分为不同层次, 而且还有公开市场和私有市场之分别。公开市场就是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商场的货架上、集市的摊床上、地摊上, 明码标价地、面对面地讨价还价, 交易是公开的, 价格的谈判也很简单。另一种市场, 布罗代尔称为反市场, 或者说是私有市场, 因为这种市场是从私人那里在不公开状态下展开的。作这种交易的人, 处于市场的上层结构中。他们而是走街串巷, 直接走向生产者去订货。他们做粮食生意, 往往不是搞现货交易, 也不热心于短途折腾, 而是付一定比例的定金买青苗。在一定程度上, 相当于期货交易。然后, 再去找买主把它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卖到价格相差非常悬殊的地方去。交易的空间距离越大, 差价越明显, 利润就越可观。远程贸易是超越平均利润的。

然而, 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这种超额利润生意的。第一, 做这种生意的商家手中必须掌握着足够量的现金, 这个足够量就是可以向生产者预付一定比例的定金, 一般不低于订货价格总额的15%。第二, 作这种生意的人必须有一个很大的相当完备的网络, 能够把订货越海飘洋地销售出去。当然建立这样一个网络也要有一定资本支持。现在的运输条件已为这种远程贸易创造了相当完备的条件。第三, 他必须握有准确的信息并能予以切实地控制。他知道什么地方什么东西最多最便宜; 也知道这些东西什么地方可以卖到好价钱。这一点很重要。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谁占据信息优势, 谁就能赚到钱。

那么, 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怎么样呢? 秦晖教授在对清

华大学学生农村调查的分析中发现,“当今国际上农业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产销方式——农户与非政府的买方(公司或合作社)协商签订种植与销售合同——对调查涉及的农户而言十分陌生:只有1%的答卷认为它在现实中存在,而希望能出现这种方式的人也只有4%。绝大多数被调查者目前还是在政府管起来和自己直接到市场上去闯荡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然而他们对这两者的信任度也都不高(分别只有39%和60%)。看来,多数农民现在只有直接‘找市长’或直接‘找市场’两种打算,然而无论‘市长’还是市场都不是那么可亲的(尽管相对而言‘市场’似乎稍好一些)”。这就极其明白地告诉我们,中国农民需要的市场上层组织结构还没有建立起来,市场上层组织的发达很可能会给中国农民和中国农业,尤其是粮食比较效益的提高带来希望的曙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却不是农业强国。这里突出的矛盾:一个是千家万户分散经营方式和越来越一体化的大市场相脱节的矛盾;一个是农业生产率和比较效益过低,使之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阻碍其增长的矛盾。”这看似一个简单的流通问题,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农民在粮食转移中实现其价值并使增值最大。

二、农业国际化的益处与中国农业国际化的国际环境

我们今天所讲的农业国际化,也就是布罗代尔所讲的远程贸易。

远程贸易不仅可以利用资源禀赋优势,而且可以利用非对称信息优势,既能节约有限的稀缺资源,又能利用非对称信息来输出富有资源,以取得比较优势之利并分散风险。关于非对称信息问题,莫里斯教授在1974年的一篇文章的例证中做了很好的说明:“设想一个由多个农民组织的经济机构,每个农民的产量既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也取决于外生的因素(如天气),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样,如果每个农民只消费自己生产的粮食,都会面临极大的风险(甚至饿死的风险)。为了降低风险,可以考虑将全部的粮食放在一起分配,每个农民都得平等的一份,这样,每个农民所遭受的风险就降低了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是,为降低‘成事在天’的风险,而导致人们没有谋事的积极性,因为当自己的消费与自己的生产没有多大关系时,谁会去努力工作呢?因而,为了让每个农民有谋事的积极性,就必须让他们承担相当的‘成事在天’的风险”。

今天,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市场交易越来越频繁,市场上层组织的发展更快了。反向市场在经济中日益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证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的突飞猛进,就是一个明证。尤其是随着Internet的形成和发展,这种变化就更大了。我们不难发现,公开

市场的活动半径是相当有限的,而市场上层组织创造的私有市场却是没有时空界限的。很显然,市场辐射力与经济实力是正相关关系。市场经济下层组织发达,并不一定能带动市场上层组织兴旺;反之,市场上层组织昌盛,却能诱发它的下层组织更加繁荣。

布罗代尔的发现启发我们,中国农业必须实现国际化,即粮食市场与世界市场对接,摒弃那些关税性和非关税性的贸易控制以及对生产者的强制性干预,实现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农业的国际化,对于克服中国自然资源短缺、农业投资不足和农业科技落后,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农业的国际化,就是大跨度地整合农业资源,凭借比较优势和贸易利益,实现国际国内优势资源的互换;大力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农业技术,以改造我国的传统农业产业,提高产业效率;有效利用国际资本与我国传统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相对接;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国际市场的广阔空间,开拓我国的国际产品市场。

当前,世界农业生产和贸易格局正处在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的转型期。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正走向高技术产业,劳动力成本与之同步提高,致使他们不得不部分地放弃或者基本上放弃在本土生产农产品,而依赖于从劳动力价格低的国家进口来维系人们的日常生活之所需,从而使全球食物市场也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不仅总量涨幅较大,而且结构变化也相当显著,并且这仍有不断发展的趋势。这就为我国大力开拓外向型创汇农业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我国农村目前剩余劳动力已达1.2亿人,且每年还将新增一千多万人。而我国土地资源的短缺,决定了我们不能再搞耗费土地资源的大宗农产品的出口。不仅如此,我国还应适当增加这方面的进口替代,把一部分土地资源置换出来,用来生产用地较少的劳动密集型的果蔬、花卉、畜牧业产品等的生产和精加工,以提高其附加值。我国幅员辽阔,纬度跨度大,气候多样,这为发展丰富多样的农产品提供了天然保障。然而,现阶段中国出口的精深加工的农产品甚少,品种也过于单调,生产者的“绿色”意识尚显淡薄,包装简陋,密封储存技术落后,“二等包装三等价格”的情况相当普遍,致使竞争乏力,从而使我们本身具有的得天独厚的农产品出口优势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中国农业国际化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农业国际化的内涵包括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参加农业国际分工,进行农产品的国际交换,促进农业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配置,并获取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利益。这显然有别于我国以前立足于自给自足,对外贸易仅仅起调节余缺作用的农业发展战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原来的农业发展战略,而提出农业国际化的战略呢?其主要原因如下:

1. 中国不能继续采取对农业的保护措施。对农业的过度保护会影响我国社会总福利水平的提高。当一种按照要素禀赋的构成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价格, 由于政府实施保护政策而提高时, 一方面, 这种产品会产生虚假的比较优势, 使过多的资源流向该类产品的生产, 而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却因此不能得到发展甚至萎缩, 从而影响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另一方面, 这种产品的高价格也会导致该种商品消费者剩余的损失。以上两方面都会影响社会总福利水平的提高。

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有两种途径: 一是对农业生产补贴, 二是实行价格支持政策。但无论哪种政策, 都是由非农业人口补贴农业人口。当补贴的政策是由多数人补贴少数人时, 才能在多数人损失少许利益的情况下, 使少数人的利益得到明显的改善。而我国的国情是 12 亿人口, 80% 是农村人口, 20% 是城镇人口, 以城镇居民的利益损失补贴农民的利益, 其结果必然是城镇居民感到明显的利益损失, 而农民并没有感觉到利益的改善。这将使保护政策的实施遇到很大障碍。

同时, 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也不允许中国实行农业保护。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中, 关于农产品贸易的协议规定取消农产品的配额制度、许可证制度等非关税壁垒, 实行关税化, 并逐步降低关税税率。协议规定, 全部农产品的关税的算术平均税率, 发达国家应于协议实施期 6 年内 (1995 ~ 2000 年) 削减 36%, 发展中国家于协议实施期 10 年内 (1995 ~ 2004 年) 削减 24%, 发达国家每一个税目的减让不低于 15%, 发展中国家不低于 10%, 每年等量实施关税减让。对农产品贸易实行保护政策, 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是相悖的。另外, 中国政府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 也已经承诺在 2020 年以前实现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贸易自由化。国际经济环境留给中国进行农业保护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

2. 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土地资源稀缺, 要求实行农业国际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数量, 1980 年为 31836 万个, 1990 年为 41009 万个, 1995 年 45042 万个, 分别占当年农村人口的 39.4%、48.7% 和 52.4%, 中国农村的隐蔽性失业人数, 在以上三个年份分别为 24329、22302 和 10045 万人。与之相反的是, 中国的土地资源异常短缺, 即使按照中国最新调整的耕地面积数据也只有 20 亿亩, 人均不足 1.5 亩, 不及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 1/3。且耕地面积质量较

差, 15 亩耕地中约有 9 亩是丘陵坡地、盐碱涝洼地和干旱风沙地。更为严重的是, 我国耕地面积正以每年 90 万公顷的速度递减。中国出于食物安全的考虑, 规定谷物的进口量每年不超过产量的 5%, 因此, 中国目前的农业生产仍以谷物生产为主。这与我国的资源状况不相适应。因为谷物类农产品生产是土地密集型的, 肉类、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及农产品加工品相对来说则是劳动密集型的。我国的农业实施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我国可以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 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参与国际资源的配置, 优化我国的资源配置状况: 一是通过直接参加国际农业合作, 输出我国的剩余劳动力, 到国外从事农业生产; 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 输出劳动密集型的季节性要求较低的肉类、水产品、水果和蔬菜, 以及农产品加工品等附加值高的产品, 进口土地密集型的、劳动的季节性较强的谷物类农产品, 使我国劳动力充裕、土地稀缺的资源配置状况得到优化。当然, 这样做势必涉及到某些专家经常提到的国家食品安全的问题。应当指出, 由于谷物出口市场的多元化, 而且各出口国都以本国得益的最大化为目标, 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大市场出现禁运的可能性似乎不大。退一步说, 只要我国把由于谷物进口所释放的土地, 用于水果、蔬菜等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的生产, 而不是用于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即使出现对中国谷物的禁运, 这部分土地也会很快还原为谷物的种植地, 从而有效的控制谷物禁运这类特殊事件对中国食物安全的伤害。

3. 农业资本资源的状况要求农业实施国际化。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提高, 对农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 而农产品的生产却受到土地资源稀缺的刚性约束。在此情况下, 要提高农产品的产量, 只能依赖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有两条途径, 一是增加单位土地的投入, 二是提高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这两者都需要大量增加资金投入。但是, 由于我国的资金短缺, 用于农业生产的投入就更加稀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 目前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剩余资金达到 7.2 亿美元。可见, 充分国外资金是中国农业摆脱资金短缺约束的有效途径。但是农业利用外资是以农业的国际化为前提的, 因为只有实行农业的国际化, 按照比较利益原则从事农业生产和贸易, 才能使投资于农业的外资获得其应得的收益, 从而进一步吸引外资投入农业生产和流通, 形成投资—收益—更多的投资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 [1] 布罗代尔. 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 1 卷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2] 王智军. 入世背景下我国农业国际化的政策选择 [J]. 银川: 宁夏社会科学, 2000, (3).
- [3] 刘振彪. 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农业国际化 [J]. 北京: 经济评论, 2000, (6).
- [4] 朱明德. 经济国际化中的农业问题 [J]. 南京: 南京经济学院学报, 2000, (1).
- [5] 赵景. 国际化战略: 理论、模式与中国的抉择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6.
- [6] 陈武. 比较优势与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化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